

## 道教源 新探

著者	涛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Taoism in East Asian Culture
volume	13
page range	157-164
year	2000-12-22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道教起源の新研究 On the Origin of Taoism
URL	<a href="http://doi.org/10.15055/00003120">http://doi.org/10.15055/00003120</a>

# 道教源头新探

齐 涛

山东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同意道教起源于原始民间宗教的观点，也同意运用彝族社会的原始文化去诠释道教的起源，但不同意道教起源于西南彝族原始文化的传播说。笔者认为，尽管道教中缺少洪水传说与创世纪，但探寻道教的源头恰恰要到洪水传说与创世纪去考察。

## 一

早在本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对道教起源作过精彩的推测，他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指出：“自东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流行着一种实质是巫术的宗教，但它却有极卓越的、精深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做它理论的根据，并奉老子为其祖师。所以能自称为道教。后人爱护老庄的，便说道教与道家实际上全无关系，道教生生地拉着道家思想来做自己的护身符，那是道教的卑劣手段，不足以伤道家的清白。另一派守着儒家的立场而隐隐以道家为异端的人，直认道教便是堕落了的道家。这两派论者，前一派是有意袒护道家，但没有完全把握着道家思想的真谛；后一派虽对道家多少怀有恶意，却比较了解道家，但仍不免于‘皮相’。这种人可说是缺少了点历史眼光。一个东西由一个比较高的阶段退化到比较低的，固然是常见的现象，但那较高的阶段是否也得有个来历呢？较高的阶段没有达到以前，似乎不能没有一个较低的阶段，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这种宗教在基本性质上恐怕与后来的道教无大差别，虽则在形式上与组织上尽可能截然不同。这个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因之，自东汉以来的道教即可称为新道教。”<sup>1)</sup>

到了最近二三十年，闻一多先生的这一推论渐被研究者重视，一批学者开始从原始宗教中探寻道教的起源，而且探寻的方向多集中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文化中所存留的原始宗教遗存。于省吾先生在《周易尚氏学序言》中曾指出：“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术占验方法之一的八索之占，古也称绳为索，八索即八条绳子。金川彝族所保持的原始式八索之占，系用牛毛绳八条，掷诸地上以占吉凶。《易·系辞》称庖牺（即伏羲）始作八卦，乃指八索之占言之。八索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继续和发展。近年来的学者们，都说八卦与伏羲氏完全无涉，这就未免数典忘祖，截断了易卦的来源。”

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近二十年来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先后出版了《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世神话》、《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均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对其主要观点，胡孚琛先生曾经概括如下：“根据民族学家刘尧汉教授对云南哀牢山彝族遗俗的实地调查和资料分析，彝族的祖先是羌戎，属于以母虎为图腾的伏羲氏部族。彝族文化流行葫芦崇拜、贵左尚黑、有‘人从水出’的传说。

彝族遗留的十月历法原是中国原始社会的历法，夏代尚实行，至商代而改变。《诗·小雅·十月之交》、《管子·幼官》和《夏小正》还有这种古老的十月历法的记载。《诗·大雅·绵》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说，说明在先民使用陶容器以前，曾有过使用葫芦容器的时代。《礼记·郊特牲》云：‘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伏羲（匏瓠）、女娲（瓜）、盘古（槃瓠）的名号都是以葫芦为姓或道号，说明道家人物继承了母系氏族先民的传统。伏羲氏族是羌戎，以母虎为图腾，贵左尚黑。夏族亦是羌戎，其祖庙称玄堂（黑堂），《礼记·檀弓上》云：‘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称骊（纯黑马），牲用玄’。老子哲学亦继承了贵左尚玄的传统，他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十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八章）。母系氏族社会先民的十月太阳历，其阴阳（雌雄、牝牡）二仪在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也由《老子》一书作了哲学概括，并为阴阳家和五行家所本。因之，刘尧汉教授得出结论：“彝族现存的祖灵葫芦和虎宇宙观是远古伏羲氏部族的自然崇拜和图腾信仰，即其原始宗教。它可称为羲、炎、黄时代的原始宗教，后被阴阳家、道家、道教继承。此原始宗教经夏、商、周迄秦汉流落于各族的民间，春秋时，经老子抽象为道家哲学体系，庄子继续吸收民间材料完善它，后汉时张陵等又将道家和原始宗教杂揉为道教。”<sup>2)</sup>

简而言之，刘尧汉先生的核心观点是源头说与传播说，他认为道教乃至中国文化之源在彝族先民古羌戎文化之中，对此，程方志先生曾概述说：“中国文明的源头之谜，国内外许多学者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一直未能解开。《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却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了充分的活史料和论证。它阐明：对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及道教，乃源出彝族及其远古先民羌戎原始道教的虎宇宙观。”“彝族宗教学派追本溯源，揭明汉族由各少数民族混合形成中的主体民族是古羌戎或氐羌，即彝族等的先民，而且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羌戎文化，而保存较多的羌戎文化的则是彝族”<sup>3)</sup>。刘尧汉还认为，古羌戎文化伴随着一部分羌戎的流徙传播到了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他是这样认为的：“道、儒、阴阳诸家引用‘三十六’和‘七十二’这两个成数，乃源出与彝族相同的历法，然而，儒、道、阴阳诸家荟萃的齐鲁与世居川、滇的彝族相距甚远，怎能相通？为此，须阐明齐、鲁乃是彝族远古先民羌戎流寓之地。”<sup>4)</sup>

## 二

笔者认为，运用彝族历史文化遗存去诠释道教的起源，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若将道教之源归之于此，则似涉牵强。尽管道教中缺少西方古典宗教中洪水与创世纪，但研究道教的起源还是要到传说中的洪水时代。

中原土地上传统中的洪水时代是尧舜禹时代，按史学界相沿已久的观点，尧、舜、禹是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时代处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门槛，他们是夏王朝建立之前，也就是距今 4000 多年前的三位英雄，但这仅仅是根据传说的推论，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令人疑窦丛生<sup>5)</sup>。而且，有关尧、舜、禹的传说到了秦汉时代已是众说纷纭，以司马迁在撰写他们的事迹时也不得不“疑则传疑”<sup>6)</sup>，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定论，更何况我们必司马迁又晚了 2000 年。笔者认为，要真正了解尧舜禹，真正认识他们的时代，必须从新的角度，寻找能勘定其时代的历史坐标，这个

坐标应该是大洪水。

尧舜禹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直到大禹时代，才历尽千辛万苦，平息了这场灾难，这场洪水之大，《淮南子·览冥训》说得很形象：“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这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次大洪水，从此以后再也未有类似洪水的发生。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世界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与神话，而且他们往往把大洪水作为自己民族的起点（或者说大洪水是古老民族记忆的起点），对大洪水以前的历史多语焉不详。中国也不例外，读一下中国早期的历史与传说，不难发现，尧舜禹是中华民族历史传说的起点，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典籍《尚书》，即“独载尧以来”史实，至于黄帝、炎帝等等的传说都是后人一步一步地追加的，也就是说，中国民族的历史记忆开始于尧舜禹时代，即大洪水时代。

那么，为什么各民族记忆的起点是大洪水呢？为什么人类就不能记忆起更早一点的事情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大洪水对各民族来说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它湮没了人类以往的文明，迫使各民族从头做起，开创自己的新世纪。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到《圣经》，从古玛雅传说到中国纳西族的《创世纪》史诗，都充分反映出这一特色。这表明大洪水的原型不是为一般的暴风雨所引起的洪水泛滥，而是一场全球性的、毁灭性的大洪水。

我们人类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大洪水？回答这个问题还须求之于地质史与气象史。

约略与我们人类共生的第四纪冰期，在距今 10 万年前左右进入了大理冰期时代。9 万年前气温降至今天的温度水平；8 万年前降至比今天约低 5℃；3 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 10℃左右；1.9 万年前开始缓缓回升；至 1.2 万年前左右才达到 8 万年前的温度水平<sup>7)</sup>。温度的降低，使冰盖与冰川迅速发育。这一时期，欧洲有斯堪的纳维亚等三大冰川中心，冰川前锋推进到了东欧与中欧，较之以往南进了 2000 公里以上；北美主要有劳伦申冰盖与科迪勒拉冰川，冰川前锋到达圣路易州，覆盖了纽约等地；亚洲主要有西伯利亚冰盖与青藏高原冰盖，后者厚达 1500 米以上；另外，中国的华北、秦岭以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都有冰川分布<sup>8)</sup>。冰盖与冰川的扩张，摄取了大量的液体水，使全球海平面平均下降了 100 米以上，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的大部分地区一度变成陆地，而且是良好的平原地貌，日本列岛和中国的台湾等岛屿也曾与欧亚大陆相连接。中国海洋学家曾成开、朱永其等人曾对当时东海平原的范围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长江口外的东海平原最远点延伸到东经 128° 以外，距今天的长江口约 700 公里。这一地区河网密布，仅长江分流的入海河流即有 16 条以上，平原的边缘地区是浅水环境，沉积物富含有机质，而后在上生长了芦苇，渐成为草丛泥沼，属陆相沉积<sup>9)</sup>。这样的平原地带还是十分适于人类居住的。中国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考古发现，但欧洲北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可以间接为证。大理冰期中，北海也曾变为陆地，使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连接在一起，现代的北海渔民常从海底打捞出石刀、石斧以及猛犸象的骨骼，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石刀、石斧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它表明在北海为陆地期间，曾经居住着人类的祖先<sup>10)</sup>。另外，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也曾变为平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提出：“在今天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是一片气候宜人的陆地，分布着众多的河谷与森林，在现在淹没的地区、当年的河谷和森林里，一定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出没其间，新石器时代的暗白种人，就是地中海种族的人，在这个已经淹没的盆地里，向开始定居和开始有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已经相当远了。”<sup>11)</sup>

当然，海水消退后的海底平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于人类与其它陆生或淡水生物共存，这段时间约为 1000 年以上。那么，东海平原与黄海、渤海平原存在多久呢？我们可以借用高保良 1976 年对这一时期日本附近海面变化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因为日本周围海面的升降变化与中国东海、渤海、黄海海面的变化应是基本同步的。高保良认为：自 10 万年前开始，海面开始下降，7.2 万年前陡然降至 -60 米以下，3 万年前又降至 -100 米左右，至 1.2 万年前复升至 -60 米左右，大约 8 千年前，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sup>12)</sup>。

海平面在 -60 米以下维持了 6 万年左右，也就是说 -60 米以上的地区的三海平原存在了 6 万年，海平面在 -100 米以下维持了 1.3 万年。-100 米以上的三海平原也存在了 1.3 万年左右，这时的三海平原，已能包括今天三海海域的大部分地区。海平面在 -140 米以下维持了约 7 千年左右，此时，亚洲大陆与日本、台湾列岛连在了一起。

在这样一块大陆上，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长则 6 万年，短则 7 万年），三海平原能是一片空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一时期原有的大陆情况吧。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即 3 万至 1 万多年以前，寒冷与干旱是中国大陆的主要气候特征，南方的湘西、黔东南温度降低值有 10~13℃，浙江为 12℃左右，渭南为 14℃左右，北京也为 12℃左右，中国东部地区的边缘区南界到达了北纬 34° 20'，长江中下游山地的多年冰土下界在海拔 850 米上下。多年来，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寒冷气候下生活的哺乳类化石，披毛犀化石出土点一直分布到中原地区，这当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取决于冻土界线的南移。中国现代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 48° 以北，而大理冰期时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 34° 左右，相差 14 个纬度，若以中纬度地区冻土区每增加一个纬度温度降低 0.6~1.0℃，中国温度在大理冰期时代要比现在低 9~14℃，比大理冰期要低 13~14℃左右<sup>13)</sup>。

冰期时代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干旱，这一点已是定论。在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由于气温的急剧下降，冰缘线与多年冻土带的南移，加上严重的干旱，必然使大批温带草木死亡，温带动物离开故土，寻求新的乐园。他们会不会固执地停留在原地呢？我认为一般不会，他们中的多数也会像其它动物一样离开已经变得陌生的环境，也去寻求新的乐园。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一部分人类留在原地与寒冷干旱抗争。

新的乐园在哪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会沿着他们熟悉的大河往前寻觅，最终到达河网密布，相对温暖与湿润的海边。渤海平原、黄海平原、东海平原逐渐成为理想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一个神话，就是麻姑的故事。晋朝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写道：仙人王远降临蔡经家，召女仙麻姑，麻姑说道：“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sup>14)</sup>这也是“沧海桑田”一词的由来，麻姑所说的东海三为桑田、还为陵陆是不是包含了先民们对往事的模糊记忆呢？

中国最早的古代传说集成著作《山海经》，目前国内外史学界与地理、地质学界都对它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记载的许多古老传说都已得到或正在得到印证。《山海经》研究专家何幼琦先生提出，《海经》中所描述的昆仑之墟是今天的泰山，并在《海经新探》一文中进行了严密的考证<sup>15)</sup>。我十分同意这一观点，按这一观点看待《海经》，原来难以解释的许多地望、部族都可以得到比较

合理的解释。在《海经》中，昆仑之墟是西方的高山，人们对它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感，比如《海经》是这样描述昆仑的：“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门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留下昆仑这一传说的部族必定活动在距此地较远的东方，否则，不会有如此强烈的神秘感。具体地点应当在黄海平原一带。《山海经·海内经》中许多难解的谜，恐怕都可以在三海平原找到答案。当然，随着后来海水的上涨，北方远古人类的活动又都集中于黄河流域，泰山已失去了神秘性，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昆仑之墟便被迁到了更遥远的西方。

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是否曾向三海平原移动，尚有待于海洋考古学的确定，但在现有的陆上考古成果看，这种移动还是有踪迹可寻的。众所周知，中国分布着众多的旧石器遗址，无论是东北、华北、华东还是关中、江南都有较多的新发现，中国也分布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新石器遗址，如7000年前开始华北有仰韶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和新乐文化，华南则以河姆渡文化与大坨坑文化为代表，这些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手工业技术，动物饲养与艺术审美观念也较发达。

但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有一个缺环，即新旧石器之交的中石器遗址十分缺少，新石器早期的遗址也比较单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指出：“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70年代以前，黄河流域初步定为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仅陕西沙苑一处。1974年，正式发表了许昌灵井的资料，1976年~1978年又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发现了有明确层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日后这批资料的发表，将会促使黄河流域中石器时代的研究前进一步。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长期以来引人注目，发现了一点线索，但资料比较零星，只是近几年来才有磁山、裴李岗、北首岭下层三处遗址的发现与进一步揭露。……”<sup>16)</sup>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磁山、裴李岗与北首岭下层遗址，只是比仰韶文化等略早一点或相当，它们都不早于8000年前，而且裴李岗与磁山文化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农业生产与精神生活，显然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因为从旧石器晚期到8000年前这一新旧石器的交接时代，正与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约略相当，这种巧合绝非偶然。

在偌大一块大陆上，分布有众多的旧石器文化与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为什么中石器文化遗址如此难觅，为什么很少发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遗址？比较可信的答案就是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渤海、黄海、东海之下，那里曾是那个时代东方人类的活动中心。而至8000年前，随着大理冰期的终止，海水上涨到今天的海平面高度，我们劫后余生的先民们又分布于今天大陆的东南西北，带回了在三海平原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化，使今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布于黄河内外，大江南北。

如前所述，大理冰期约在1.9万年前开始走下顶峰，约于1.2万年前开始逐渐结束，温度较快地得到回升，海洋面不断上涨，到8000年前左右，中国的气温已略高于今天，海平面也基本相当于今天海平面的水平。在这4000年间，战争与洪水是当时两大社会主题。冰后期的温暖不仅使海水猛进，而且还带来大雨滂沱与河水泛滥。猛涨的海水与泛滥的河水不断袭击着那些居于三海平原的先民们，这种袭击有时是毁灭性的。残存的部落、幸免的人群纷纷涌向高地，离开了他们生息繁衍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故土，重新回到他们远祖的土地。部落之间，先到者与后到者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战争，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开始了，上古残缺不全的文字记载也开始透露出这一时期先民的



某些信息。

在甲骨文中“昔”字写作“𠂔”或作“𠂕”，表明过去发生的、在先民中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洪水，以至于把太阳下汹涌的洪水当作“过去”的代名词或象征。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记忆。这应当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大洪水，尧舜禹都与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尚书·尧典》称帝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也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时的洪水主要是指海水的上涨，《孟子·滕文公下》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水“逆行”即指往西流的洪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水一般是由西向东流，只有海水上涨时，才能出现水逆行的情况。

由于这时的主要洪水威胁来自海水上涨，所以尧派出的治水大员鲧便采取了堵的办法。中国上古史籍中常常能见到“鲧堙洪水”、“鲧障洪水”等记载。在海水缓缓上升时期，“堵”是防止海侵的唯一有效途径，不过，鲧面临的却是海水的不住地上升，堵不胜堵，最后以失败告终。

禹的时代要晚一些，《吕氏春秋·应同篇》说：“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草木秋冬不杀”，说明此时黄河中下游的气温已接近亚热带的水平，由史料又能看出这种气温的变化是在禹时开始的。根据中国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段万倜等先生所作《我国东部地区冰后期气候变动表》，自8000年前开始，中国东部地区处在一个相对高温期，较今天高出2~3℃，较一万年前高出了7~8℃<sup>[7]</sup>。基于此，可以认为，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大约就跨越了这一冷暖交替时期。这一时期，海水的大规模上涨基本停止，河水的泛滥也略有减轻，先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遍地的积水与沼泽，在高温作用下腥臭污秽，农业生产无法展开。《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记道：“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歃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生水不可居也。”

面对这种情况，大禹治水主要采取了“疏”的方法，《国语·鲁语》所说的“疏川导滞”，是对大禹治水的较好概括，大禹治水取得了成功。此后，先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洪水灾害，大禹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

与鲧、禹治水的同时，尧舜禹部落联盟体系与共工、三苗等部落联盟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共工是中国上古时代一个很有特色的部落，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古书中多传共工的事迹，上及远古，下到虞夏，可以指明共工在古代为一显著的氏族，共系地名，工未知何义，对于共工氏的传说颇不一致，有恭维他的，也有诋毁他的，可是不管恭维还是诋毁，他的传说及乎全同水有关。……但是，他的建国在今何地，古代无传。”徐先生之言十分正确，共工与水总是紧紧相连，甚至被目为水神，不过，我们还可以细究一下故实，看看共工与什么样的水有关系，它为什么未给后人留下它建国之地的什么影子？

《淮南子·天文训》称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实际上是古人把地上河水和远处的海水都涌向东南低地的解释，《淮南子·本经训》更明确地认为共工是大洪水的祸首：“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树木。”

人们为什么要把共工当成洪水泛滥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要与共工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呢？

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这样的：在大理冰期时代结束前，共工等部落居于三海平原的深处，尧舜

禹居于高处，或者是跨有今天的陆海相邻处。在冰期结束后的洪水上涨中，共工氏等部落联盟步步后退，与居于高处的部落势必发生战争，而居于高处的人们看到共工到哪儿，洪水就跟到哪儿，因此便认为共工“振滔洪水。”正因为共工的家园彻底地藏身海底，所以，“它的建国在今何处，古代无传。”

《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不合，名曰不周……有禹攻共工山。”不周山在何处？《山海经》又称：“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山有名不句，海水入焉。”清楚地表明共工的根据地不周山在大海之中。《吕氏春秋·求人篇》也记道：“禹东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丘之乡。”注：“青丘，东海地名。”这些残存的传说向我们表明尧舜禹联盟曾与共工在今天的海底发生过战争，而共工的家园也在大海之下的某一位置。

三苗的情况与共工相似，《山海经》称其居赤水之东，依何幼琦先生的解释，赤水即今山东得沂水，沂水距黄海不足一百公里，因此居赤水之东的三苗部落应当是居于黄海平原。

尧舜禹部落联盟对共工的、三苗等部落的战争，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尧舜禹部落联盟巩固、扩展了他们在东方的统治，“共工流于幽州，窜三苗于三危”。将这些大洪水的幸存者驱赶到周边地区。

长期以来，中国神话发展史上有一个难解的谜，就是为什么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地流传着灾难性的大洪水的传说与创世纪史诗，而中原与东部沿海地区却只有零零星星得记载？现在看来，原因十分清楚，尧舜禹部落联盟由于居于高地，洪水未对他们形成灾难性的打击，而饱尝洪水之苦的劫后幸存者又被尧舜禹驱赶到了边远地区，所以，灾难性的大洪水的传说也集中流行于这些地区。

从西南少数民族史诗中，我们不时可以读到这一段历史的影子，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写道：“西伯勒木库，有个大金海，金海深无底，金海大无边。阿黑西尼摩，我们的祖先，生在金海里，长在金海边。”苗族史诗《跋山涉水歌》写道：“家祖在东方，挨近海海边，天水紧相连，眼望不到边。”

### 三

通过对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的回顾，对于道教的起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道教的源头可以说是原始宗教，而且是尧舜禹与共工、三苗共同创造的原始宗教，这些内容在尧舜禹的后人那儿不断变化与消失，而在相对封闭的共工、三苗的后人那儿尚有较多的存留，可以据此探寻道教之源。

第二，道教形成于尧舜禹之后中原文化的土壤中，前已阐明，这一文化是未经过洪水劫难与洗礼的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它所蕴含的宇宙观、生死观对于道教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应是道教的本源所在。

### 注

- 1) 《闻一多全集》第1集，第143～144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 2) 牟钟鉴、胡孚琛《道教通论》第16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
- 3) 程方志《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载《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世神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4) 刘尧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第 55 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5) 请参见《古史辨》中的有关论述。
- 6) 《史记·五帝本纪》
- 7) 13)17) 见段万倜等《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8) 见周廷儒《古地理学》第 6 章、8 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9) 曾成开、朱永其《东海陆架古海岸线的沉积地貌标志辨识》, 载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国第四纪海岸线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
- 10) (德) F·鲍士凯《不解之谜》第 48 页,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译本。
- 11) 《世界史纲》第 122 页,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译本。
- 12) 转见刘敏厚《晚第四纪海面变化——XI 届 INQUA 会议海岸线分组会简介》, 文载同 9)。
- 14) 《太平广记》卷六十引《神仙传》
- 15) 文载《山海经新探》,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 16)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3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